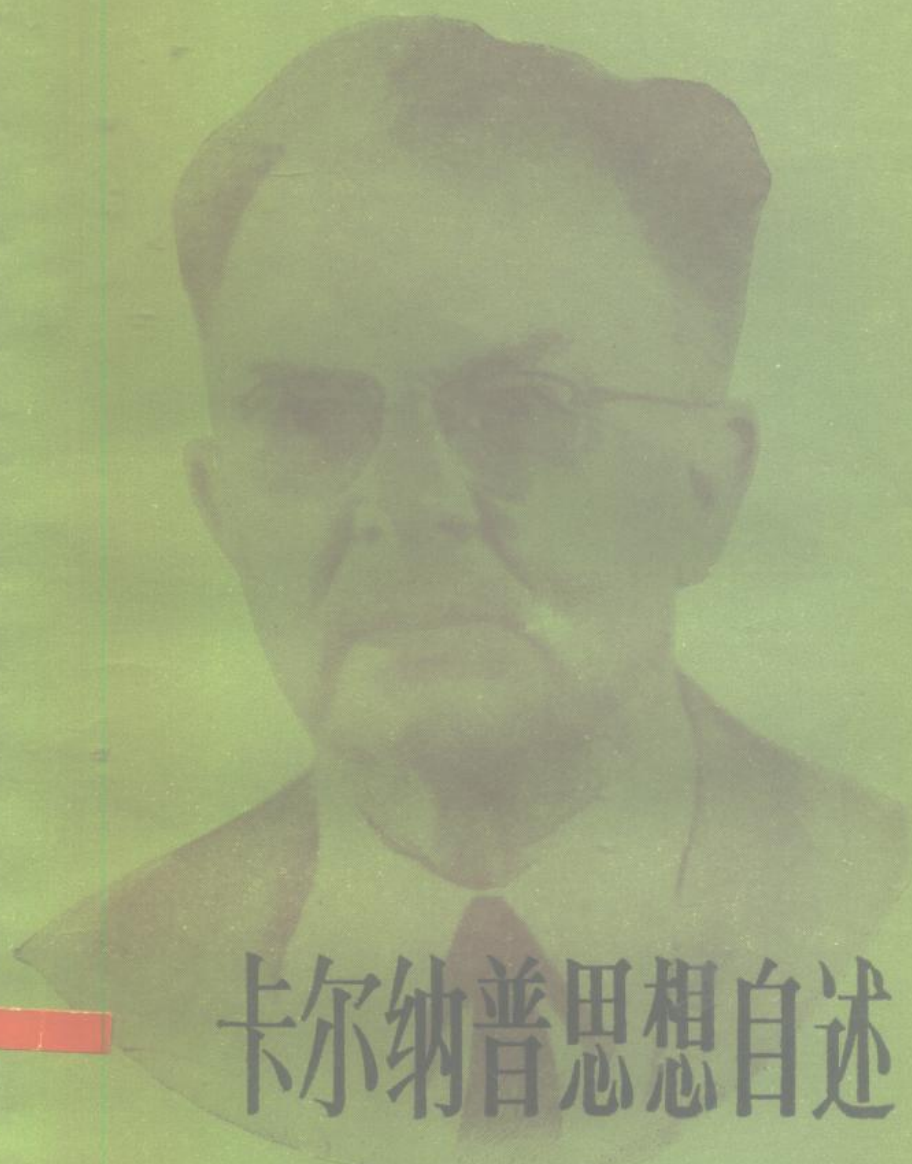


A faint, monochromatic portrait of Karl Popper, an older man with glasses and a mustache, wearing a suit and tie. The portrait is centered on the cover and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title text.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

上海译文出版社

70457



2 021 8478 7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

〔美〕鲁道夫·卡尔纳普著

陈晓山 涂 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 Carnap

CARNAP'S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First Edition, 1963.

根据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第一版译出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

〔美〕鲁道夫·卡尔纳普 著

陈晓山 涂 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南漕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85,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2188·19 定价：0.76 元

译者的话

鲁道夫·卡尔纳普是本世纪西方哲学界盛行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绩斐然。为此，我们翻译了《卡尔纳普思想自述》，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卡尔纳普本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当代欧美分析哲学运动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从《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卡尔纳普在如下几方面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而进行的工作。第一，他把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之间的论争归结为运用不同的语言系统所致，并提出“容忍原则”，主张对不同的语言系统持容忍态度。卡尔纳普的这一观点也就是逻辑经验主义对待不同的语言系统所持的基本观点。第二，他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被视为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该书从一个简单的经验的基本概念，引伸出其他经验科学的概念，从而构造了一个概念系统。卡尔纳普是第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第三，他提出了一种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构造一种形式的符号语言的想法，并建立了一套对语言形成结构及其表述的纯粹逻辑分析的句法理

论。在此之后，他又建立了语义学的理论，即关于意义概念和真理概念的理论，从而补充了他的句法理论。他还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两个概念，并特别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卡尔纳普关于元语言概念的提出，为以后在美国兴起的关于“元科学”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卡尔纳普提出了科学统一的原理，即认为，经验科学的各个分支仅仅是由于分工的实际原因才被分割开来，它们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统一科学的若干部门。这个统一科学的基础就是物理学。不仅如此，整个经验科学都可用物理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因为用物理主义语言描述的事件，从原则上说是所有使用该语言的人都能观察到的。经验科学的语言又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观察语言是理论语言的基础，从观察的角度讲，理论语言只能部分地被验证。第五，卡尔纳普在后半生主要致力于经验科学的理论基础即归纳逻辑的研究。他这方面的观点与卡尔·波普正好相反。波普否认归纳法对科学理论的作用，他发展了一种确证假说的纯粹演绎的理论。卡尔纳普认为，他发现在归纳推理的基础上有一些严格规则完全类似于纯粹演绎的理论，运用这种理论，就能够证明归纳逻辑至少象演绎逻辑一样是合理的。于是，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将归纳推理规则加以精确表述和论证的工作。

卡尔纳普的上述这些学术成就显示了其整个思想系统的宏大和深刻，但也暴露出他因其狭隘的纯语言—逻辑

辑观点所造成的一系列缺陷。例如，他认为哲学问题归根到底只是语言逻辑问题，不同的哲学派别之间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不同类型语言的使用问题。这样一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成为是使用“实在论”语言还是使用“唯心论”语言的问题，根据卡尔纳普的这种错误观点，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之间就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对立只是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差别，这显然是历史上各种调和倾向的一种新的表现。再如，卡尔纳普对知识的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他仅仅抽象地从语言 - 逻辑方面来分析经验知识与科学理论，完全排除了一切社会实践的和历史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知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历史地看待科学知识的演变和发展，这也是他对于经验科学理论的许多研究，如统一语言与统一科学、归纳逻辑、意义标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收效不大的原因。总之，卡尔纳普虽然为创立和发展逻辑经验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的上述错误是根本性的，不可忽视的。

本书译自保尔·阿瑟·希尔普主编的《当代哲学家文库》第十一卷：《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哲学》。

本书的翻译工作承蒙北京大学洪谦、王太庆、陈启伟等教授热情帮助和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3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思想发展.....	1
一、我的学生时代.....	1
二、我的哲学研究的开始(1919—1926年).....	14
三、维也纳小组(1926—1935年).....	29
四、在美国(1936年—).....	53
(一) 我在美国的生活	53
(二) 美国的哲学状况	61
第二章 哲学问题.....	68
五、哲学中的假问题.....	68
六、数学的基础.....	72
七、物理主义与科学的统一.....	78
八、语言的逻辑句法.....	84
九、经验主义的自由化.....	89
十、语义学.....	95
十一、语言设计.....	108
十二、概率和归纳逻辑.....	114
十三、理论语言.....	125
十四、价值与实际决定.....	131
卡尔纳普主要著作表.....	137

第 一 章

我的思想发展

一、我的学生时代

1891年我出生在德国西北部巴尔门附近一个叫作隆斯多夫的地方。我的父亲，约翰尼斯·S·卡尔纳普，出生于一个贫穷织工的家庭。但是由于他长期不懈的勤奋努力，最终使他的生活富裕起来，并且由此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我的母亲，安娜·卡尔纳普·尼·德普费尔德，她的祖先，曾经是教师、牧师和农民。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她就已经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撰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在书中，我的母亲描写了她已故父亲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的外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德普费尔德，终生执教并写作一些与他的教学工作有关的书籍。我深为这种把思想写在纸上的奇妙方法所吸引，并且从此也喜爱上了它。

我的父母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的信仰渗透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我的母亲经常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即

宗教的精髓并不全在于接受某些信条，还包括奉行一种善良的生活。在她看来，一个人只要严肃地追求真理，那么接受其他教派的信条就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态度使她能够非常宽容地对待那些不同教派的信徒。

当我和姐姐都到了学龄的时候，我的母亲得到允许在执教之余兼做我们的家庭教师。她教了我们三年，然而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她不甚看重所学教材的数量，而是着重帮助我们对所学课程获得一种清楚的和融会贯通的知识。她尤其注重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1898年我的父亲不幸去世后，我们迁居到巴尔门。我进了中学，那里的课程以古典语言为主。我最喜欢的课目是数学和拉丁文。数学以其概念的精确性和纯粹思维证明结论的可能性吸引着我，而拉丁文则以其合理的结构使我产生了兴趣。

1909年我们又迁居到耶拿。从1910年到1914年间，我在耶拿大学和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大学就读。起初，我专攻哲学和数学，后来物理学和数学又成为我的主要专业。在选择课程时，我只是凭自己的兴趣，而不考虑什么考试或职业问题。如果我不喜欢那门课，我就不去听，而代之以阅读相应方面的书籍。

在哲学领域中，我主要对认识论和科学哲学感兴趣。但是在逻辑的领域里，当我听了弗莱格的讲座从而了解到一种真正的逻辑后，我感到哲学家们讲授的逻辑课程和写作的有关著作就显得枯燥乏味，甚至是完全过时的

东西。在耶拿大学，我与布鲁诺·鲍赫一同研究康德哲学。鲍赫所在的讨论班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详细地讨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康德关于空间的几何学结构是由我们的直觉形式所决定这一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我的论文《论空间》（写于1920年，参见本书下一节）中关于直观的空间一章，能够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的结果。

一旦回想起由赫尔曼·诺尔（当时耶拿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所主持的一个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讨论班，我的心中就充满了特别的愉快和感激之情，即使他所探讨的课题，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一书，常常远离我的主要兴趣。我和我的朋友们特别推崇诺尔，因为他与当时德国的大多数教授不同：他对自己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有一种个人的兴趣。他在讨论班上和私下的交谈中，往往试图让我们通过了解哲学家们对生活的态度及其文化背景来加深对他们思想的理解。

总而言之，在哲学的领域中，我认为自己通过阅读和交谈，较之听讲座和参加讨论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研究数学。哲学的诸多流派都处在无休止的争论中。而与此相反，在数学的领域中，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得到精确的证明，因此不会产生什么分歧。但是我从大学的各种讲座中所获得的最大启发，既不是来自专门的哲学讲座，也不是来自专门的数学讲座，而是来自弗莱格关于数学与哲学之间的学科，也即符号逻辑和数

学基础的讲座。

哥洛伯·弗莱格(1848—1925年)那时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却是耶拿大学唯一的特邀数学教授(副教授)。他的著作在德国几乎无人知晓,无论是数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未曾注意到它。弗莱格对这种明显的冷遇深感失望,有时还很伤心。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主要著作——两卷本的《算术基本规则》,他只好自费印刷出版。另外,由于罗素发现了弗莱格的数学体系和坎特的集合论中存在的著名悖论,使得弗莱格尤其灰心丧气。我不记得他在讲座中是否曾经讨论过这个悖论问题以及为了排除它而可能修改他的整个数学体系的打算。但是从《算术基本规则》第二卷的附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弗莱格相信能够找到克服困难的令人满意的方法。他丝毫也没有其他作者有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由于数学的“基础危机”所产生的悲观情绪。

1910年秋天,我仅仅是出于好奇心,参加了弗莱格举办的“概念符号”讲座。我只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有人觉得这个讲座很有意思。除此之外,我对班中的成员和所讲授的题目都一无所知。我们发现,很少有其他学生参加这个讲座。弗莱格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老。他的身材并不高,表情似乎有点羞涩,性格也显得特别内向。讲课时他很少看听众。当他在黑板上勾画他那符号体系的希奇古怪的图型,并加以解释时,我们通常只能看到他的后背。无论是在课间还是在课后,都没有一个学

生向他提问或作些评论，似乎没有什么继续讨论的可能性。

临近期末的时候，弗莱格明确地指出，他给我们介绍的新逻辑可以用来构造整个数学体系。他的这些话引起了我们的好奇。1913年夏季学期，我和我的朋友决定听弗莱格的“概念符号”讲座的第二期课程。这一期全班只有我们两人和一位退役少校。他完全是出于某种嗜好而研究数学中的一些新观点的。从这位退役少校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坎特的集合论思想，而在此之前，竟没有一位教授提到过它。弗莱格在这个小组中大概感到更加自在一些，因此态度也较为和缓，不过仍然没有人提问和讨论。²但弗莱格却偶尔地批评起其他一些观点来，有时用讽刺的口吻，有时则变成挖苦。他特别抨击了那些形式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宣称数字是纯粹的符号。尽管弗莱格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没有表现出多少机智嘲讽的特点，但在他的《论H·舒伯特先生的数》^①一书中，却有一种令人发笑的讽刺笔调。在这本小册子中，弗莱格嘲笑H·舒伯特在一篇关于数学基础的文章中所给出的定义。该文章曾作为大部头的《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一卷中的第一篇而发表。（幸运的是，在该书的第二版

^① 我有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它是由弗莱格自费出版的（耶拿，1899年，共32页）。我不曾看到有人在任何一种资料中提到过它（除了在教会那本关于符号逻辑的书目中。这本书目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编成的）。我不知道哪个图书馆还保留着这本小册子。我这里有一个该书的微缩胶卷，并且愿意把它提供给任何一位对此感兴趣的人去复制。

中，赫姆斯和朔尔茨的出色文章取代了舒伯特的这篇文章)。弗莱格指出，舒伯特发现了一条新的原理，弗莱格提议将其称之为差别的非差别原理。他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得出最惊人的结论，舒伯特的这一原理能被最有成效地加以运用。

在“概念符号”讲座的高级班课程中，弗莱格解释了各种应用问题。其中有一些观点没有包含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例如一个函数的连续性定义和一个函数的界线定义；通常收敛和一致收敛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概念都可以借助于量词来表达。这些观点在弗莱格的逻辑体系中是第一次出现的。弗莱格还论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的逻辑错误。

尽管弗莱格列举了许多在数学中有趣地应用其符号论的例证，但是他通常并不讨论一般的哲学问题。在弗莱格的著作中有一点相当明显，这就是他意识到，由他所创立的新工具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然而弗莱格本人却从未向他的学生们清楚地讲明这一点。所以，虽然我对弗莱格的逻辑体系有着强烈的兴趣，但当时却对这个体系的重大哲学意义毫无觉察。直到很久以后，也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我更用心地阅读弗莱格和罗素的著作时，才认识到，弗莱格的著作不仅对于数学基础的研究，而且对于一般哲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

1914年夏季学期，我选修了弗莱格的“数学中的逻辑”这门课程。在这门课中，弗莱格批判地考察了数学中

一些为人们所公认的概念和公式。他对于数学家们甚至似乎并不打算构造一种统一的、基础牢固的数学体系，因而暴露出他们对数学基础缺乏兴趣的情形深为叹惜。弗莱格指出，在袭用的一整套数学公理、定义和证明中，甚至在某些更著名的数学家的著作中，也存在着某种明显的不确切性。他引证了魏尔斯特劳斯关于“一个数是同类事物的一个级数”(…eine Reihe gleichartiger Dinge)的定义作为例子。弗莱格特别批评了那种不注意某些基本差别的作法，例如，在符号与用符号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在一个逻辑概念和一个心理意象或活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在函数与函数的价值之间的差别。不幸的是，弗莱格的告诫甚至在今天也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关于经验的诸学科中，物理学对我最有吸引力。人们居然能够以精确的数字关系来陈述规律和一般地描绘并解释各种事件以及对未来事件作出预测，这种事实深深地打动了。

1913年，我为了写作博士论文，开始进行一些物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具体研究的问题是，在真空中尝试从一个加热的电极中发射电子。这个任务在技术上是相当困难的，况且我也绝对不是一个出色的实验人员。因此研究工作的进展相当缓慢。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我不得不中断了实验。和我共过事的那位教授在战争一打响就不幸罹难。

我对其他领域中的知识也有兴趣，我广泛地阅读了

许多方面的书籍，并且曾经仔细地考虑过，是否更透彻地研究其中的某些著作。但当时我只是在心理学方面听过一些课和参加过讨论班并做过一点试验。当看到除了物理学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经验学科中都存在着不确切地解释概念和形成规律的现象、以及大量的缺乏充分联系的事实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还在进大学之前，我就逐渐开始怀疑宗教关于世界、人和上帝的教义。作为一个学生，我更加审慎、更加坚决地拒绝接受这些信仰。在大量书籍和与朋友们交谈的影响下，我领会到，这些教义倘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它们将与现代科学的结论发生矛盾。特别是将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物理学中的决定论发生矛盾。当时德国的自由思想者运动主要以“一元论者同盟”为代表。我热切地研究了运动的领导者们的著作，例如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和著名化学家欧海尔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而只能算是通俗读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感到他们的著作或体系常常显得相当粗糙。尽管如此，我仍然同意他们关于科学方法是获得基础牢固和系统连贯的知识的唯一方法的论断。也赞同他们以合理的手段来改善人类生活的人道主义目的。

我的基本信仰的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起初是去掉宗教教义的超自然色彩。我不再把基督看作神，而是把他看作人中间的一个成员，

即看作发扬仁慈德行精神的一位卓越的领袖。而后，我又抛弃了把上帝看作人格的（虽然是非物质）、为了实行奖惩而干预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而代之以一种泛神论。我的这种泛神论带有某些斯宾诺莎主义的色彩，但不是从斯宾诺莎本人的著作中引伸出来的，而是从歌德等人那里得来的。我对歌德等人的著作、人格以及生活的智慧极为赞赏。因为我的泛神论受诗作的影响甚于受哲学著作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泛神论中，与其说具有理论性质，不如说具有伦理性质。这就是说，我的泛神论与其说是一种有明确系统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对待世界和人类的态度。以至后来我愈益坚信，倘若不把泛神论看成是一种情感和伦理态度，而是看作某种教义，那么，它就不可能被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所有事件，包括那些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和社会中的各种事件，根本不需要任何关于上帝的观念，而只需用科学的方法便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在抛弃对人格化上帝信仰的同时，我还抛弃了对人格的和有意识的灵魂不朽存在这一教义的信仰。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科学世界观中连续性观念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人类是从低级的有机体逐步地演化过来的，而不是以什么突然的变化方式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精神活动过程都与人的大脑密切相关。人体一旦毁灭，这些精神过程何以继续存在？由此，我又逐步地得出一个明确的自然主义观点：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

一个组成部分。人是有机体的较高级形式，象其他有机体一样会死亡。这里仍有一个历史事实有待解释，即为什么对一神或多神的信仰以及对灵魂不朽的信仰非常广泛地存在于所有已知的文化之中。不过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和心理学的問題。我根据人类学在研究宗教观念的历史演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渐渐地找到了一个答案。很久以后，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发现了上帝的观念是从父亲这个观念演化而来的，这些思想使我在理解关于个体范围内状况的发展方面，获得了十分重要的认识。

因为我从我父母的生活和自己的孩提生活中受过一种生活宗教的积极影响，所以我对那些有着高尚人品的人们由衷地敬慕，并且从未因他们信奉传统的或其他形式的宗教这一事实而有所减弱。在目前的文化发展阶段上，许多人仍然需要宗教的虚构信念和想象。在我看来，任何企图剥夺他们从这些观念中所获得的精神支持以至嘲笑他们的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神学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神学仅仅是由诸多学说汇集而成的体系，不是一种反映生活价值和生活习惯的体系。系统的神学要求阐述关于所谓超自然秩序的存在知识。但是这种要求也必须象其他任何一种知识所要求的那样，用同样严格的标准加以考察。现在据我看来，这种考察已清楚地表明，传统神学是古代思想的残余，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格格不入。任何一种